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十四辑

商务印书馆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四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XIÀNDÀI GUÓWÀI JINGJIXUÉ LÚNWÉNXUǎN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四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81-X/F·80

1992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1/32

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5千

印数 0-1400册

印张7

定价: 3.20元

出版说明

在西方经济学界，继“凯恩斯革命”之后，出现了对西方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派、供给学派——和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凯恩斯主义）与新剑桥学派（英国凯恩斯主义）。但不管怎样，西方许多经济学者都承认，就整体说来，他们的“经济学处在危机中”，“将丧失其自命为科学的这个较为浮夸的称号”；“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丹尼尔·贝尔等编：《经济理论的危机》）。对此，早在70年代初，一位英国学者弗里茨·舒马赫就断言：“经济学解释经济的实际运行的能力看来是极其片面和有限的。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经济学改善经济运行的能力，更是片面和有限的了。我个人认为，开始学习这一颇为诱人而要求又极高的学科（经济学）的学生未必认识到这一点，不知道经济学教师是否会把这一点告诉学生，或许教师自己也未很好地考虑过这些——我怎么说呢？——超经济问题”（琼·罗宾逊编：《凯恩斯以后》，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3页）。

那么，经济学的解释的性质是什么？英国经济学者马克·布劳格回答说：“就这些解释由明确的理论所组成来说，这些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特别是，经济理论中的假定与预言性的含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经济学家靠援引事实证据来证实他们的理论，则那种证据只是与理论的预言性含意有关呢？还是与理论的假定有关呢？或者与两者都有关呢？而且，当作经济学家的事实证据究竟是什么？声称解释是什么的经济理论也用几乎相同方式来表明

应是什么呢？这样做又怎样呢？换言之，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或者用老式语言，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技巧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1980年英文版，“序言”第12页）。所有这些问题确实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

美国经济学者艾尔弗雷德·艾克纳认为，为证实经济理论上的任何命题，逻辑检验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重要的是必需进行一系列的、实质上属于经验的检验。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理论还需进行实践检验，即必须说明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必须接受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的检验，必须证实预期的结果。据艾克纳的意见，现在西方流行的微观经济理论是以新古典派的四个基本要素或理论结构为其基础的，即：

- （1）每个人的一组无差异曲线；
- （2）每种产品的一组等产量线；
- （3）所有不同厂商的一组正斜率供给曲线；
- （4）所有投入要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一组边际实物产量曲线。

艾克纳指出，上面四个基本要素都是无法从统计或经验的资料来求导出的，或者实际上无法证明它们没有错误。所以，艾克纳断定，“这四个理论结构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可靠基础，而是导致基本错误的根源。”

至于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艾克纳看来，除了它是以同样的微观理论作为基础外，还增加了两个理论结构为其基础，即希克斯—汉森的 IS—LM 结构和菲利普斯曲线。但是这两个理论结构在经验上也是令人很怀疑的，因为它们都未能完全通过一致性经验检验，更不用说通过实践检验了——实践证明，菲利普斯曲线早已破产了。

因此,艾克纳宣称:“抛弃上述六个理论结构,经济学教科书就没有多少真实内容了,而且剩下来的命题也将缺乏逻辑的一致性”。他特别指出:如果“以为理论(至少是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不是去解释在可观察到的条件下实际上发生的过程,而是从逻辑上确定达到某个目标(即资源最佳配置)所必需满足的条件”,那么“科学的目的就完全被颠倒了”。他进而申明:“这里不是反对数学的利用,甚至也不是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化,而是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误用或滥用,特别是反对用数学来对一个不能接受任何经验检验的理论体系给以科学的伪装。”(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

的确,从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的选择来看,当前西方经济学可分为两大派,即新古典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派等)和后凯恩斯主义者(英美的新剑桥学派等)。新古典主义者着重运用的是实证研究法,而后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规范研究法。因此,前者与后者相比,关心“如何”胜过关心“为何”,关心经济模式的逻辑的、内在的一致性胜过关心模式的现实性,关心机械比拟胜过关心生物比拟(特别是有机变动的可能性),关心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函数关系胜过关心因果序列。实证研究法的新古典主义者更不愿考虑动机的形成,不愿考虑社会、政治、历史和制度的因素、信息系统以及文化观念的变动对经济活动的产生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当然也就不考虑影响经济目标和联合行为的因素的全部复杂性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并不力图使他们的变量成为容易的可计量形式,因为他们的经济研究的目的主要不是预测,而是分析、解释现实问题,他们的论著较明显地尽力讲现实问题,而非假设的问题。相反地,新古典主义者研究的首要重点是理论的精确化,更着重于形式上的推理方法,所以他们更大大地利用数学。

数学和经济计量学现在正支配着西方经济学文献和大学高年级学生的课程教学。对于这种倾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里昂惕夫曾写信给美国的《科学》杂志,他批评道:“专业经济学杂志连篇累牍充满着数学公式,诱使读者从一组或多或少似乎有理实则完全任意的假定得出精确的、用数字表示但又不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里昂惕夫:《经院式的经济学》)

事实胜于雄辩。在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经济困难问题时,西方经济学中无论哪个学派的处方也还没有成为灵丹妙药,他们自己正议论纷纷。有人指出:“如果经济学家希望成为真正有用的人,他们现在就必须专心致志地对超经济学进行系统的研究(按指必须:(1)分析经济学家提出的定理与命题的主要本质;(2)研究物质因素,研究经济学推理所需要考虑到的物质因素的本质与本性;(3)完整地研究人,不是单纯地研究“经济人”,一个没有生命的抽象的人。见琼·罗宾逊编:《凯恩斯以后》)。有些人建议,应从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回到“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研究范围内。有些人指出,分析经济问题不能忽视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因素的作用。而且,不少人还反对脱离实际,单凭假设条件,追求数学模型的狂热。甚至有些人已提出,需要吸取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内容,沟通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以便实现他们的“经济学革命”。有人主张重建经济学,使它作为政治哲学的一个附属分支。美国纽约大学商业研究院管理学荣誉教授彼得·德鲁克预言:“无论如何,下一代经济学无疑地将还是政治经济学,它包括世界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经济现实同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内,这两者对经济理论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是很易引起争论的”。(见丹尼尔·贝尔等编:《经济理论的危机》,第27页)

注意当前西方经济学者关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论方面

的论辩,并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争论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和创新是有借鉴或参考作用的。为此,我们编译了这辑论文选,供大家参阅。译文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以后·····	〔英〕理查德·斯通 (1)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歧·····	〔英〕菲利斯·迪恩 (22)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44)
科学中的经济学·····	〔美〕佳林·库普曼斯 (61)
实证经济学·····	〔加拿大〕A. 科丁顿 (83)
规范经济学·····	〔美〕马丁·麦圭尔 (103)
一般均衡理论·····	〔美〕E.R.温特劳布 (108)
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区别 ·····	〔美〕威廉·杜格 (127)
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	〔美〕艾尔弗雷德·艾克纳 (137)
经济计量学——炼金术还是科学? ·····	〔英〕大卫·亨德里 (150)
经院式的经济学·····	〔美〕沃西里·里昂惕夫 (174)
扩张中的经济学领域·····	〔美〕杰克·赫什利弗 (179)
译名对照表·····	(209)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以后^①

〔英〕理查德·斯通

一 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危机

一个多世纪以前，在1876年5月31日，为纪念《国富论》出版一百周年，政治经济学协会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随后便进行讨论。格拉德斯通先生担任主席，辩论是由罗伯特·洛开始的。洛担任过商务部和教育部副大臣和格莱斯通首届自由党政府财政大臣，后来被擢升为贵族，名叫谢尔布鲁克勋爵。在对亚当·斯密和他的著作作了一番颂扬的评论之后，洛用几句话对留待政治经济学去完成的事情作了结论。他认为剩下的事情不多了。他承认，“如果被称为社会学（这是当今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的与人类有关的其他科学获得一个春天，达到政治经济学所达到的确定程度，那么，前景将会改观。”但是，他似乎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他最后说：“我们目前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存在着的争论，虽然为逻辑学专家提供了基本练习，但不象早期那样具有惊人的重要性。这项巨大的工作已经做过了。”（政治经济学协会，1876年，第20—21页）

大约在同一时间，沃尔特·巴吉霍特在1876《双周评论》上发表文章，从这个学科的基本前提的再考察中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象凯尔奈斯和杰文斯这样不同的经济学家，对那时奉行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说服力感到有些疑虑。在亚当·斯密以后发展

① 本文系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讲词，1980年7月24日。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

起来的英国古典传统中,这门学科被描述为一门演绎科学,主要关心物质财富,证明与自由放任学说一致,不大关心细节的观察(认为这些观察充其量只能阐明从几个基本假定中推演出来的一些命题的真理),自我意识到与研究人类社会的其它学科联系狭小,思想保守,在早期获得胜利以后,日益与时代精神失去联系。在1870年伦敦大学学院讲话中,凯尔奈斯说:“我从当今的文献和社会讨论中似乎看到一种信念的迹象:政治经济学已失去了有效的推理。然而,我担心我必须再前进一步,承认在这个国家里,有些精力充沛的有才智的人甚至把它看得比无效还要坏——看成是有用的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物,一个实实在在的障碍物”。(凯尔奈斯,《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873年,第238页)也是在1876年伦敦大学学院所作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前途的讲演中,杰文斯把他的观点总结如下:“简言之,它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在《国富论》首次出版后的一百年,我们发现这门科学几乎处在混乱不堪的状态中。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现在确实比30或50年前意见更不一致。”(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的前途》,载《双周评论》,1876年,第20卷119期,第620页)

这次危机的其它迹象也能容易找到。在1877年,弗朗西斯·高尔顿建议取消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F 分会(即经济科学和统计学分会),主要理由是,提供给分会论文的科学意义小。实际上,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告诫。在1860年,纳索·西尼尔在这个分会会长就职演讲中,对涉及到事实和原则的科学同使用科学的艺术作了区分。他说:“在经济科学和统计学的严格界限内,一个巨大的领域向我们敞开着。似乎对于我来说,在可行和便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这个领域以内,尽可能少地偏离那些科学提供原则的许多艺术,那么,我们就会取得良好的进展。”显然,这种劝告没有受到 F 分会会员的重视,而在同时,高尔顿却使这个劝告成为他的破坏性建议,被包括在学科内容和论述方法都极为

广泛的这样一些论文中：1873—1875年的论文目录从诸如统计汇编、罢工经济法、资本和货币科学等等完全正统的题目到诸如桑蚕的气候适应性、贵妇人的家庭服务、把亚历山大港的倒塔迁移到英国的费用和适当性等等七零八乱的题目。不能否认，高尔顿有道理，但是，他要令人信服却极为困难。由于遭到威廉·法尔和统计协会理事会的反对，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第二年，协会在都柏林开会，F 分会会长是三一学院的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他经历丰富，先后担任修辞学和英国文学教授、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图书馆管理员等职务，他还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史》（1888年初英文版，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1878年的会长就职演讲提供了一个捍卫这个分会和论述政治经济学当前状况和未来前途的良好机会。他把他的论述概括为四个命题：“（1）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系统地与社会存在的其它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2）过分抽象的倾向和非现实的简化应该制止；（3）先验的演绎方法应该改为历史的方法；（4）建立在那些规律基础上的经济法规和实施方案应该尽可能少地用绝对形式来设想和表述。依我看来，这些就是在经济研究行为中和在它的结论说明上所需要的重大改革。”

这样，英格拉姆对英国经济学批判的回答是极力推崇新历史学派。这个学派发源于19世纪40—50年代的德国，以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的著作为代表，它对其它大陆国家的经济思想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用贝尔吉安·埃米尔·德拉弗利（他是政治经济学协会宴会上的客人）的话说，历史学派认为，“分配无疑部分地受自由契约支配，但它也是而且更多地是受民事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道德情感、习惯和历史传统的支配。”他继续说：“它本身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囊括政治经济学与道德、正义、权力、宗教、历史及其与所有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依我之浅

见,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实际使命。”(政治经济学协会,1876年,第31页)

众所周知,马克思走得更远:经济现象不单单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而且它们还是统治社会机体的支配力量。但是,在我说的那个时代,马克思的思想在英国还不够广泛地为人所知,并不包括在持续的争论中。只是后来,他的信徒们才进入这个领域。

英格拉姆对先验的演绎方法的不信任不是孤立的。例如,克利夫·莱斯利拥有一个甚至更极端的观点,这个观点使他把政治经济学的演绎方法看成如果不是荒谬的,也是贫乏的。

我认为,我以上所说的足以表明,一百年前,在这个国家里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普遍感到不满意,也许,我应该说,在《国富论》出版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中,政治经济学没有发展。但是,宣告政治经济学灭亡的预言家们被证明是错误的:复活正在来临。

二 19世纪末:一些新动向

在演绎方面,从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和瓦尔拉斯(《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1874年)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1870年代开始了边际主义革命。马歇尔在那时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虽然《经济学原理》在后来才发表。到19世纪90年代,费希尔(《价值和价格理论中的数学审查》,1892年)、维克塞尔(《价值,资本与地租》,1893年)和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程》,1896—1897年)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这次创造活动的浪潮带来了对比以前更复杂的数学技术的需要。那时很多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是数学家,他们广泛地运用他们的数学才能。

在归纳方面,越来越意识到数字资料(过去的和当前的)的重要性。在19世纪的英国,图克和纽马奇(《1793—1856年价格和流

通状况史》1838—1857年)、罗杰斯(《英国农业和价格史》1866—1902年,《劳动和工资的六百年》,1884年)、杰文斯本人(《通货与财政研究》1884年)以及后来的鲍利(《十九世纪联合王国的工资》1900年)所阐述的数量经济学史正在独自创建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分支。对零散地贯穿于19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资料的收集工作正在发展:官方统计资料的范围和数量正在扩大,精力充沛的人对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实地考察。这种私人积极性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查尔斯·布思的《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一个在1886—1902年所作的社会观察,最终以确定的形式发表于1902—1903年。附带指出,在从事这个工作的一群助手中,我们发现年轻的比阿特丽斯·波特,她不是《彼得·拉比特》的创作者,而是西德尼·韦伯未来的妻子。布思不相信通则化,对不能得到数量值的那些事实,他坚决不予使用。在提交给1887年统计学会的研究托尔·哈姆雷兹关于居民的生活条件和职业的一篇论文中,他宣称:“无论正统还是非正统,由于缺乏现实性,政治经济学的先验推理都是无用的。在它的基础上是一串与所观察到的生活现实没有多大联系的假定。”(见《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50卷,第2篇,第376页,1887年)当时在场的马歇尔反驳说:“他确信,他所乐意知道的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说,这篇论文中没有一行不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考虑。”(同上,第392页)

虽然布思从他的资料中得出很多合理的结论,但是,他没有数学工具,以致不能从这些资料中提取其中可以产生的信息。实际上,收集资料的人很少有这种工具。不过,在更有科学头脑的人中,这些资料的存在却刺激了他们对能处理它们的复杂性的分析方法的探讨。埃奇沃思和鲍利就是恰当的例子(鲍利:《统计学大纲》1901年;《埃奇沃思对数理统计学的贡献》1928年)。

随着理论的演进和观察的大量增加,经济学家越来越确信把

它们联系起来以互相说明的合意性。在上世纪末，再没有一个人对经济理论讲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对价值论说过的话。穆勒说：“令人高兴地是在价值规律方面，有待当前或未来著作家去澄清的东西没有了，这个课题的理论已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1版，第3篇第1章）把这一点与马歇尔在1902年对埃奇沃思的一番论述对比一下：“我辩论的要点是，经济学家的工作是要解决复杂原因的错综结果；由于这一点，一般推论是必要的，但是，对事实广泛和透彻的研究同样是必要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唯一正当经济学。我认为，当经济理论把只有原始的、无分析的历史宣称为正当经济学时，它就是一个有害的骗子。”（庇古编：《对马歇尔的回忆》1925年，第437页）帕累托持有同样的观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中，他借用亨利·波因凯尔的话说：“关于社会科学，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进行精确的观察，然后把它们与理论结果进行比较。”（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指南》1906年，英译本，第11页）

在那时的著作中，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社会现象的相互依存性和经济活动依赖其它力量而不是纯粹经济力量。其实，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是历史学派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到19世纪末，这个原则把某些经济思想先驱者作为它的信徒，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帕累托。马歇尔也承认它的有效性，虽然他不是全心全意。在《经济学原理》中，他把他的观点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孔德在坚持社会现象的统一性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他没有表明对这些现象的某些种类进行特殊研究是没有用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1版，第72—73页）

虽然指望意见一致是很难的，但我认为，到19世纪末，几乎没人否认：（1）在演绎方面，边际分析占了上风；（2）在归纳方面，统计资料不再受到轻视；（3）经济理论的阐述和资料的分析日益要

求使用数学；(4)正当经济学依赖演绎和归纳的结合；(5)经济现象在原则上应该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这样，由于更精细的耕耘，新的领域被开拓出来，老的领域更加肥沃。

扩展的过程自那时以来一直继续着，并且还在继续着。自然，它已导致更加复杂化以及相应的劳动更细的分工。但是，尽管专门学科为数众多，对于我来说，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可以归于三种类型：思辨型、活动型和调查探究型。思辨型观察机器，试图从它发出的信号中解释它的运行状况；活动型不喜欢它表现出来的运行方式，而是设计改进的方法；探究型试图把它拆细，了解它实际上怎样运行。在我们这个世纪，所有这三种类型对共同的任务，尤其在信息交流网开放的地区作出了并还在作出有益的贡献。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全部考虑，所以，在这篇讲演的余下部分，我将考虑其中一些贡献。如果我偏爱思辨，我就谈论纯理论的进展。如果我是一个活动家，我可以谈论福利经济家，税收政策，凯恩斯或者也许甚至马克思。因为我只是一个调查探究者，所以，我将谈论我调查研究过的领域以及我为此而使用的工具——尤其是数量分析、经济动态和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汇，我将称之为社会经济计量学。

三 数量分析

在1871年，杰文斯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将有一个完善的统计体系，而缺乏它是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之唯一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缺乏完全的统计时，这门科学依然是数学的，但是，就其精确程度而言，它还远非有用。”(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第1版，第14页)25年后，马歇尔向新老经济学家参加的剑桥经济学协会作了一次讲演。他说：“一般说来，19世纪已大部分完成了经济学的定性分析，但它就此却步了。它感到定

量分析的必要性,对它取得成功的方法进行了初始的考察,但是,这种成就本身留待着你们去继续发扬。”(庇古编:《对马歇尔的回忆》1925年,第295—311页)

对待数量分析,马歇尔并非意指经济统计,甚至也不是指插入经济论点中的和用来阐明论点的统计数据。他这番话是要阐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相平行的。在数量分析中,每个任意函数给一个特殊形式,每一个任意参数给一个数值,每一个滞后时间给一个确定的长度,等等。实际上,在《经济学原理》中,他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统计将被编制用来提供十分可靠的需求表,用直观的图解形式表明从社会和私人活动的不同习惯方式中产生的消费者租金的量。这种希望大概不是不合理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1版,第471页;第8版,第492—493页)换言之,这个程序可以填充克拉潘的空经济箱,然后,把它们与整个经济过程的可计算模型结合起来。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正是20世纪已经做的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在本世纪初,数量经济学由几个孤立的研究和一大堆倡议所组成。数字资料意义上的统计仍然稀少并且编制得很差,尽管最近得到改进;评价与推断意义上的统计比较新,还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很好地理解;计算依赖原始的写字台上的计算工具。没有一种制度能给分散的和无经验的工作人员以具体的指导和支持。在我提到的著名经济学家中,第一个看到组织国际性思想交流讨论会的必要性者是欧文·费希尔。卡尔·克赖斯特说:“早在1912年,当费希尔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副会长时,他试图组织一个促进数量和数理经济学研究的学会。韦斯利·C.米切尔、亨利·L.穆尔和其它几位经济学家很感兴趣,但他们人数太少,因此,当时他们的想法没有实现。”费希尔失望了。很多年以后,在1928年,当弗里希和鲁斯持有同样的思想,并请求费希尔支持时,费希尔很悲